

哈耶克与罗尔斯

在这里达成了共识

FREE MARKET FAIRNESS

市场是公平的



[美] 约翰·托马西 / 著
孙逸凡 /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FREE MARKET
FAIRNESS**

市场是公平的

[美] 约翰·托马西 (John Tomasi) / 著
孙逸凡 /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场是公平的 / [美] 托马西著; 孙逸凡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Free Market Fairness

ISBN 978-7-5520-1049-7

I. ①市… II. ①托… ②孙… III. ①自由市场—市场经济—研究 IV. ①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61220 号

John Tomasi

Free Market Fairness

ISBN: 978-0-691-15814-3

Copyright © 2012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roprietor's edi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5-914

市场是公平的

著 者: [美] 约翰·托马西

译 者: 孙逸凡

责任编辑: 唐云松

出 版 人: 缪宏才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p.org.cn

印 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6.25

插 页: 1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049-7/F · 326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文版序

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中道尝试

何怀宏

了解当代美国思想学术的人都知道,今天美国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思想流派已经不是 19 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一种更强调实质平等的自由主义,它有时被称为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更高级的自由主义,或者说是自由主义的左翼。这一左翼可以说是学院知识界的主流,与之相对的有自由主义的右翼——常常被翻译为“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的思想流派,但这一译名其实容易和在哲学形而上学上与决定论相对而言的自由意志理论混淆,而这里的“libertarianism”实际是一种政治哲学和理论,它强调的不是意志,而是一个人的全面活动的自由——包括经济领域内活动自由的至上性,所以我更倾向于将“libertarianism”称为“自由至上主义”,而将古典自由主义称为“自由优先主义”,将当代的自由主义左翼主流称为“平等优先主义”。当然,这些都是在“自

由主义”的范围里讨论,它们都没有脱离自由主义的大范畴,即在政治领域内都赞成保障所有人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它们的差别主要在于在经济领域内是主张平等优先还是自由优先。自由主义在反对专制主义时可以保持为一个阵营,因为在政治领域内争取自由和平等是一致的;但在处理经济领域的自由平等时却出现了分化,因为在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和平等常常并不能够兼得。

托马西在他的《市场是公平的》(*Free Market Fairness*)中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中道,但批评者或可认为是中间偏右的中道。这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弥补,因为作者认为美国学术界偏左的理论十分丰富,而偏右的理论却相当贫乏。托马西对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概念做了一些梳理,追溯了西方从“古典自由主义”到“高级自由主义”的演变过程。昔日的自由主义主流观点持有者已经变成了今天的自由主义的右翼,甚至自由主义的标志也被左翼拿去了,他们变成了“保守派”。

或许是作为一种补充甚或纠偏,托马西提出了一种对他心仪的“市场民主论”进行独特解读的“自由市场公平论”(*Free Market Fairness*),认为“市场民主”理论可以结合他认可的四种观念:1. 经济自由是自由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面向;2. 社会是一个自发的秩序;3. 制度和政策必须是为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接受的,即必须能够向这一社会中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慎思地证成;4. 社会正义是政治评价的最终标准。如果说,前两个观念主要是来自自由优先主义的话,后两个观念则主要是来自平等优先主义。而这两方面在他的理论中是结合在一起的,即他认为经济自由恰恰应该

也是社会正义的第一级要求,即和言论与结社自由、政治参与权利等基本权利分量一样,个人经济自由也应属于自由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我们用罗尔斯的话语来解释,那就是经济自由也应当列入罗尔斯的第一正义原则。

这种“经济自由”包括经济活动和契约的自由以及享有合法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成果的自由,所以,“自由市场公平论”要把不被国家干预的财产权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但也不将其绝对化,所依据的理由也和自由至上主义者有所不同。托马西说“市场民主论”接受对社会正义的人道主义而非平等主义的解释,更关心穷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绝对占有情况而非平等本身,希望选择最能造福于他们的制度。它尊重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也坚持所有公民尤其是最弱势的群体分享自由社会红利的权利,并努力将这一最弱势群体所能占有的财富实现最大化,但认为我们必须小心地以一种尊重这些处境最差的公民的自主权和尊严的方式来为他们谋福利。

托马西不是仅仅从效率、从工具、从手段的角度来捍卫自由市场,而是也从道德的角度来捍卫自由市场,他参照传统划分出人的两种核心的道德能力:一种是人自身的负责自主发展能力;一种是将其他所有公民同胞尊为同样的负责自主性发展主体的能力。他认为不能自我剥夺,或者剥夺他人作为同样的自主发展主体的基本权利,在提升人们的自主性发展的道德能力方面,经济自由所具有的价值,和思想、信仰、集会、言论等方面的自由的价值十分相似。而且,财产权不仅本身值得捍卫,它还是抗击暴政、保障其他

基本权利的一个堡垒。

托马西的理论是一种“作为自由市场的公平”，但这里的市场还不是纯粹的市场、放任的市场，而是民主的市场、自由的市场。他的一个中心观点是经济自由仍然和其他基本自由一样是基本的自由。他似乎在提醒自由主义者们：我们在引入高级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的观念时，不要舍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自由。

也许从立国时候就有这样重视独立的传统，在当今美国社会，还是存在着一种相当强大的、被内格尔称为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至上主义”，它今天也常常被称为“保守主义”。许多普通人即便并没有成为豪富的希望，他们也非常珍视自己在经济生活中的独立自主。即便有些国家的税收主要是向豪富征收，他们也反对这些税种，因为他们担心由此过于扩大国家的权力，如托马西所言：“他们将抵制这种税收看作有关道德原则的问题”。他们在自我经济决策的过程中而非无论名义的还是实质的分享财富的过程中，也找到了自己作为主人翁的感觉。他们希望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与事业。

有一点特别值得玩味。如托马西指出的，自由主义左翼在学院精英中是占统治地位的。在学术圈中，左派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已被广泛接受，甚至可以说定义了“道德现状”(moral status quo)，但是和社会大众之间却存在一定的隔膜。许多学术精英自认是最关心社会中下层的大多数人的，但大多数普通人的所望所求却并不一定是他们想象的那样。比如说，许多普通人可能更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也

可能宁愿接受某些收入差距带来的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

托马西提醒左翼知识分子说,有些生活经历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只有亲历者才能深刻地体会,比如为人父母、自办企业等等。在许多道德问题的判断上,一般公民与哲学家相比同样可靠,有时甚至更可靠一些。如果大批普通公民的道德信念偏离了哲学家的道德假设,哲学家们也有理由根据事实来重新思考自己的道德预设。既然左翼思想家将普通人视作和自己一样的自由平等的公民,就有必要考虑他们真实的所欲所求。

人们可能都有程度不同的对独立和共契的需要,但偏重不同,有些人可能更希望较独立的、自立的、互相保持一定距离乃至一种冷淡但也比较宽容的社会;还有些人则可能更希望关系较紧密的、互相帮助乃至依赖且彼此抱有更大热情的社会。和欧洲社会有些不同,美国社会的许多人看来更重视前者,因而也更重视自己的生活和收入不被国家干预和侵犯,他们的态度相对偏右,或者说偏保守,对扩大国家能力抱有很大的警惕。许多普通人,包括小业主,乃至工人,对自己所理解的幸福和获得幸福的路径也有自己的看法。所以“茶党”运动也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中国一样,美国近二三十年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思想分歧和政治上的党派分裂,虽然这种分裂的烈度不像中国那样巨大和对立,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能力。

的确,如果说人们能够享有良心自由、言论自由、政治自由,但却不能享有经济活动和稳定地拥有从这些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成果的自由,那么,不仅一项重要的自由要被剥夺,前面的那些基本自

由也难说能够得到完全的保障。财产权常常是能够保证其他自由的自由,这方面从“只有一个国家雇主”的社会中经历过来的人应该说更有体会。自由的财产权和投资权也是最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社会财富,提高整体收入水平——包括穷人生活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我们肯定经济自由和市场,但的确也应注意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注意人道和人性,也注意我们的国情和民意。所以,一定程度的、偏向较弱势群体的“再分配”也有其强大的道德理由。所以,我们也应推动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向“均富”的方向发展。但我个人对“均富”的理解主要是:所有人均是富有的,都达到了一种人之为人的体面生活,但它并不是对财富的完全平等的分配,并不是平均财富。经济或者说物质生活条件是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但我们要注意区分经济正义中满足生命原则与满足平等原则的不同,也预防在生活中过于注意和重视物质的危险。另外,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法治和监督制度,强调扩大政府权力的再分配就有可能只是将财富从一个少数群体转移到另一个少数群体手里,底层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仍然得不到根本的改善。

在自由主义的理论谱系中,或许托马西是中道偏右,罗尔斯是中道偏左。罗尔斯的第二正义原则,尤其是关心最弱势者的差别原则虽然表现出一种平等主义的倾向,但罗尔斯通过“反省的平衡”来寻求“重叠共识”却可以为寻求中道提供一个恰当的途径,这种“反省的平衡”就包括社会常识与理论原则之间不断的互相调整和修正。

左派理论多多,右派理论很少,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右派没有自己富有影响的思想家,仅仅一个安·兰德的社会影响,可能就胜过许多左派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很少为自由市场辩护,也许也无须太多辩护,自由市场自有它强大的动力和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虽然作者谈到可能来临的左派思想的黄昏,但目前美国社会观念总体趋势似乎还是朝着自由派而非保守派希望的方向发展,即向着更多的提携弱者和实质平等的方向发展。

托马西说他并不奢望已经有确定立场的知识分子改变自己的观点,他主要对那些还没“站边儿”的人说话。这样一种比较低调的抱负也许反而更可取。总之,我以为在如今西方知识左翼的思想理论流行——包括也在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时候,听一听一个试图寻求中道但可能实质观点偏右的思想者的声音,是有好处的。托马西的思想理论不是凭印象和激情发言,而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学术探索的结果,故而即便对不太同意其观点的人来说,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刺激和理论贡献。

致 谢

ix

许多同事、学生与朋友在我写作这本书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他们包括：Sahar Akhar, Larry Alexander, Richard Arneson, Bas van der Bassan, Anthony Bedami, Zack Beauchamp, Barbara Buckinx, Steve Calabresi, Yvonne Chiu, Tom Christiano, Mark Cladis, Ross Corbett, Dina Egge, Michael Frazer, Bill Galston, Jerry Gaus, Scott Gerber, Alex Gourevitch, Charles Griswold, Leigh Jenco, Kate Johnson, Laura Joyce, Mark Koyama, Chandran Kukathas, Mark LeBar, Hugh Lazenby, Helene Landemore, Brink Lindsey, Loren Lomasky, Roderick Long, Minh Ly, Matthew Lyddon, John McCormick, David McIlroy, Eric Mack, Jim Morone, Emily Nacol, Jan Narveson, Michael Novak, Carlos Ormachea, Carmen Pavel, Philip Pettit, John Phillips, Jeppe von Platz, Dennis Rasmussen, Danny Shapiro, Paul Starr, Annie Stilz, Jason Swadley, Adam Tebble, George Thomas, Scott Turcotte, Chad Van Schoelandt, Debra Satz,

Doug Den Uyl, Keven Vallier, Andrew Volmert, Steve Wall, Greg Weiner, Dan Wewers, Will Wilkinson 和 Matt Zwolinski。

在许多发来书面评论的人中,有一些需要在这里专门列出以示感谢,他们是: Samuel Freeman, David Schmidtz, Steve Macedo, Richard Arneson, Jacob Levy, Tom Spragens, Danny Shapiro, 以及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稿人。其中 Freeman 和 Schmidtz 给予了我特别的帮助。Sam 和 Dave 从不同的政治观点出发,对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予以鼓励。这些支持一直以来对我都很重要。

布朗大学是个进行政治哲学思考与写作的特别的地方。我要感谢我的同事 David Estlund, Sharon Krause, Corey Brettschneider 和 Charles Larmore。他们给我的建议与我们之间的友谊使我获益良多。布朗政治理论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员们一直是个能量与理念的源泉。分别来自亚利桑那大学与布朗大学的博士候选人 Keith Hankins 与 Jason Swadley 是勤奋而具有创造力的研究助手。在我撰写本书的这些年里, Jason Brennan 一直是我在政治理论项目中的邻居。平时与杰森的交谈,使我对本学科的现状有了更好的了解。Jason 与我不仅是普通的同事,更是思想上的同伴。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我们都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这里我对他表示感谢。

我曾就这本书的主题作过许多次公开的讲演,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在纽约普林斯顿俱乐部举办的曼哈顿研究所 2007 年哈耶克讲座;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主办的 2008 年布拉德利讲座; Doug Massey 在普林斯顿组织的议题为“自由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会议;还有一个在多伦多举办的,以“自由意志主义:道德辩护是可能的

吗?”为中心议题的 2009 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讨论组(由 Steve Macedo 主持)。我在亚利桑那大学、布朗大学的读书会,以及人文学科研究院举办的社会变革研究生读书会中获益良多。在 2011 年加利福尼亚拉荷亚的嘉域殖民地拉霍亚酒店中,针对这本书最终版的热烈讨论尤其给了我很多启发。当时参与讨论的人有: Arneson, Schmitz, Wilkinson, Long, Alexander, Macedo, Shapiro, Wall, LeBar, Stilz, Hankins, Zwolinski。我在这里由衷地感谢你们。

Ian Malcolm 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没什么希望的项目充满了信心。我要感谢 Rob Tempio 把它重新启动并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题词源自我曾经的老师 G. A. Cohen 创建的一个著名的学习小组的口号,我将它做了些修改。[九月学会,由主张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组成。这里提到的口号原本是“*Marxismus sine stercore tauri*”,意即“马克思主义没有废话”,作者将它改成了“资本主义没有废话”。]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 Amy、Peter 和 Lydia。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和他们的美国梦。

前 言

xi

我有一些最好的朋友是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我这么说并不是想强调一种常见的理解:尽管这些人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但我们依然是朋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相反的意思就能够成立,但它确实更接近我的本意。事实上,一个人若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那便足以勾起我与其结交的兴趣。因为在我眼中,自由意志主义实在是种让人着迷的政治观点。

我这里所说的是通俗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通指与自由民主政治体中的右翼相关的一组政治理念。在这一广阔的传统中,理论家们出于不同的原因,支持各种有限政府与广泛个人自由的理念,这在经济事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而现在我选择将所有的古典自由主义者(classical liberals)、经济自由主义者、无政府资本主义者(anarcho-capitalists)、右翼自由意志主义(right-libertarians),或是那些坚持自称为真自由主义者(real

liberals)①的人统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

对于我来说,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传统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对财产权的重视。所有自由主义者都将涉及公平审判、言论自由、政治参与、个人自主等权利的个体公民权与政治权利看得很重,但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独特之处则在于,他们强调诸如创办企业、以个人身份商谈劳动待遇,以及决定如何花费(或储蓄)个人所得的那些资本主义经济权利同样是自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喜欢自由意志主义的这一点。在它最好的那一面,我看到自由意志主义者从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政治主体性(political agency)②理想出发为财产权辩护。对于他们来说,人们出于自己的行为与选择而占有财物这件事,比占有财物本身要来得重要。当我们处于自由的状态时,便会意识到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要驱动者。这么说并不是特指商业巨头或是安·兰德(Ayn Rand)小说中那些用经济上的成就定义自己的英雄。许多诸如中产阶级夫妇、单身母亲、初入职场的工作者这类普通人,通过自己在工作、储蓄、消费上的选择成就了他们自己,也表达出了自己的人生愿望。在这些方面,人们凭借努力工作赢得他人的尊敬,自己也能感到些许自

① 真自由主义者指信守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那群人。这种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对经济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兼顾高级自由主义对关于社会正义的理想。本书所有带圈的脚注均为译者所加,以与不带圈的尾注相区别,后者为原书作者注,集中于每章末尾。以下不再注明。——译者注

② 参照下文,agency 在这里的意思应与伦理学、政治哲学上的“主体”有关。

豪。在经济事务中,自由意志主义者坚持认为人们不应当只关心结果,经济行为的过程也应被纳入考虑。无论社会发展的目标有多么崇高,如果它以减少个人在经济事务中的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只会流失个人生活中的活力。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眼中,当个体的经济自由被削减时,人们在某种重要意义上就变得更不自由。信服这一思想传统的人还从工具理性的角度为财产权辩护,认为财产权与其他基本权利息息相关,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鼓励人们承担责任、减小政治权力集中所带来的风险。但对于我来说,自由意志主义者所主张的财产权保卫自由的观点才是最重要的。

我同样被自由意志主义者关于“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的观点所吸引。有些时候直截了当地追求社会目标最有效率,例如开展政府项目确保某些人们所需的产品与服务能够及时提供。但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则强调在其他情况下(很可能是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目标最好是用间接的方式来达成。商品市场是自发秩序的典型范例。绝大多数普通商品(例如铅笔)的生产,依赖于一个极为庞大和复杂的系统的运转。这个系统中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参与者,有护林员、矿工、海员、冶金学家、化学家、胶水工、会计等。正如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所观察到的那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位个人”知道如何制作一只铅笔¹。但铅笔确实是生产出来了。这些复杂的生产性系统并非人所设计,而是演化形成,它们是人类行动而非设计的产物。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认为自由社会最好应该被理解为由自发秩序形成的社会,其中人们应该有根据那些只有他们自己

才知道的信息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权利。自由意志主义者有关自发秩序的理论关于私人经济自由的道德理想一起,深深地吸引了我。

xiii 与世界上许多其他人一样,我将这些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与美利坚合众国联系在了一起。美国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亲资本主义文化的国家。不仅如此,历史上许多时候美国都背离了资本主义自由,有时甚至严重违背了许多基本的自由价值。尽管如此,自由意志主义似乎与美国普通大众的愿望有着一种特殊的联系。美国梦认为美利坚是一个企业家的国度。18世纪90年代,联邦党领袖古尔奈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曾骄傲地将自己的同胞称作“商业时代的长子”。²在这一愿景中,美国并不是一个坐拥保证的地方,而是充满机遇的土地。在独立宣言中,人们并非有权利得到幸福,而是有权利追求幸福。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将人们暴露在失败的危险之下,也恰恰因之而赋予了他们自力更生成就事业的机会。在迪恩·阿尔芬奇(Dean Alfange)的诗中,“美国人的信条”包括以下几点:“我不愿意做一位被圈养的公民,/卑微而又无能,/享受国家的照顾。/我愿冒那可预计的风险,/去梦想,去创造/去失败,去成功。”³在这一愿景中,无论美国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都有理由感到自豪,因为这是他们自己亲手创造的成果。

我们可以争论今天美国人是否仍然信守个人责任与自主性发展的传统价值,甚至还可以争辩美国人是否应该继续信奉这些原则。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美国式”的社会生活愿景。它为我早先提到过的两种哲学思想——私人经济自由以及作为自发秩序的社